

自由谈

城市规划不能只仰仗西方经验

赖世刚 韩昊英

建构在牛顿力学上的西方科学，成就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影响所及，几乎遍布所有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自不例外。例如，牛顿科学的宇宙观是机械的，因此，自100年前城市规划学兴起时，城市规划设计师便视城市为简单与线性的机器，进而将城市切割成不同的空间构件，如区划中的分区，将工业区、商业区与住宅区分隔开来，以避免它们互相干扰。然而，到了1960年代，规划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城市是复杂与非线性的，传统视城市为机器的观点应该被有机的城市观所取代。而后者直到最近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才逐渐地被规划学者们接受。

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城市空间单元类似机器的零件，是可以取代及替换的，而后者认为这些单元如生物体的器官，无法任意取代及替换。

举例来说，台北市的士林夜市与上海

市的新天地，都是十分成功的商圈，每年均吸引无数的游客造访与消费。但是如果我们将上海市的新天地搬到台北市或是将台北市的士林夜市移植到上海，我们可以预期这样的规划安排将使得这两个商圈的功能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士林夜市与新天地的营运模式已经与周边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当地客群的结构与客源以及商圈内小吃的口味与店铺的设计，已经与周边的建筑环境、道路网络、车流、人流以及生活习惯打成一片。破坏这些商圈的社会经济脉络，例如改变街区的尺度以及道路的走向，将阻碍原本运作顺畅的人流与物流，导致商业活动的减少，乃至整个地区的衰败。

另外，从更大的尺度来看，台湾本岛过去35年来已呈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具体而言，研究发现自1971年至2000年，作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全岛约350个乡镇的人口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明有显著的城市化现象发生。而这一趋势并不受

1978年贯穿全岛南北(基隆市到高雄市)中山高速公路通车的影响。为减缓城乡差距，台湾当局陆续兴建从台北市到高雄市的高速铁路并于2007年通车；此外，更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以及高雄市的五大城市，于2010年分别合并附近行政区升格改制为五个直辖市(其中台北市为旧有直辖市)，以平衡区域的发展。即便如此，台湾的人口近年来仍然有向全岛最大都会区台北市及新北市迁移的趋势，这与传统城市经济学的预测相反。

反观内地最近提出的两横三纵的全国城市发展蓝图，企图以高速铁路串连21个城市群，以减缓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如上海市及北京市迁移的趋势。若从前述的台湾经验来看，这一规划对于实现平衡区域发展的目标，仍有较大难度。

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城市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快速增长。为了解决日渐严重的城市化问题，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各种规划理论充斥在神州大地，包括智

能型增长以及新城市主义等等。但是，这些由境外移植而来的学说，能否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令人质疑的。

可以说，中国目前不乏规划理论，所欠缺的是深植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式规划理论。举例来说，源自前苏联计划经济以设计为基础的城市规划手法，并不能解决巨型城市如北京市的城市快速蔓延的问题。例如，以往的研究已经显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不能将土地开发控制在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开发中，有超过半数的新开发用地都位于该规划范围之外。

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以有机体观点看待城市发展及规划的新范式正在形成中。这个范式与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就城市方面而言，我们大胆地认为，传统的易经及道家学说可以做为城市理论的基础。例如，易经六十四卦实际上就是复杂城市系统的缩影，构成了所有城市发展型态的宇集合，“阴”与

“阳”分别代表城市中的设施与活动，于是城市发展的变化便可应用这个宇集合加以建模与预测。另一方面，道家学说的立论基础也正是复杂科学的有机宇观。在这个观点中，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现象，而且也存在着自组织的规律。例如，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产业在城市中会自然而然聚集而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区块就规划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将规划与决策讲解得最为透彻。例如，在“计”、“形”及“势”等篇都精辟地解析决策与规划之间的依存关系，而其精微缜密之处，甚至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思想。

我们当然不赞成忽略近代西方科学的贡献，而一味回到数千年的中国科技时代。然而，这些中国古典学术论著包含了最纯粹及最具创意的科学思想，我们应该立基于先贤的智慧基础上，稳健地向前开展，以建构一个蕴涵在神州大地的中国城市规划理论。

(作者分别是台北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合作办学 为何掉进功利陷阱

——国外高中究竟有哪些不同(三)

熊丙奇

近年来，高中国际班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据媒体报道，国际班已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进军。举办高中国际班或中外合作项目，有一个重要价值，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提高我国教育质量。但笔者在加拿大考察一些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学习生活发现，中方办学者往往用国内传统的做法，“管理”这些学生。这既让学生不满，还制造新的留学焦虑。

温哥华公立教育联盟(VPEA)是一家在加拿大为中国中学留学生提供“落地服务”的教育机构，他们会帮助留学生入学、入住homestay、规划学业，并解决在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中有一项工作是要及时与学生国内的家长联系沟通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以便让留学生能更好地成长。

这一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她与家长、学生的沟通，都很顺利，但在和国内学校负责人的沟通过程中，却有不少问题。比如，应国内学校的要求，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发给学校，这本很正常，学校作为合作办学方掌握学生成绩也无可厚非，可校方拿到成绩后，不经处理就发布在论坛上，所有该项目的同学、学生家长都能看到，这令留学生们十分不满。在加拿大中学，学校告诉学生，学习成绩是学生的隐私，怎能不经学生同意就随意发布呢？

某个学生在加拿大与homestay的房东发生摩擦，或出现女生到男生homestay去玩的情况，校方得知后，会在召开合作项目家长会时，点名批评学生，这令家长颇为难堪，同时因孩子在异地他乡，不了解情况而心急火燎。可实际上，这根本就没什么事，只是沟通中出了问题，这类问题，加方学校总是冷静，把它交给学生自己处理。而国内学校却十分敏感，时刻盯着学生，希望其按自己的设想成长。

这在学生选课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加拿大中学实行完全学分制，每所中学开设的选修课达160门左右，除少数几门必修课外，学生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但对于留学生的选课，校方是有要求的，要他们一定要选什么课，以便今后能申请更好的大学。学校对缺乏选课体验的学生进行一定的选课指导(加拿大中学里就有专门的学业规划咨询老师)，是有必要的，比如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兴趣，结合未来的学业发展与职业发展选择、组合课程，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学生。后者还是功利化、应试化的学习方式，与国外教育鼓励个性、发展学生兴趣，为学生提供更多元选择空间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中国学校推出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不是要突破应试教育重围吗？为何还要用应试思维去对待学生的学习呢？这值得所有开设中外合作项目的国内学校深思。诚然，中学举办国际合作项目，有着极为现实的压力，既来自政府，又来自家长。学校希望所有项目的参与学生，都能申请进入世界名校，这无疑是最好的合作办学政策，也是招生的法宝。可是，这和国内高考强调进名校的校情结构有何两样？

可以说，这是功利教育观之下的功利合作办学与功利留学，还是没有回到教育是让每个学生生活得更美好的本质。考察加拿大教育，笔者发现，办学者在努力给学生一种幸福的教育生活，学生有充分的自由，乐在其中。不少中国留学生也十分享受这种自由的氛围，但始终摆脱不了功利的盘算。

我们的诸多教育者，是对当下的应试教育、功利教育深恶痛绝的，中外合作办学给了突围的可能，为何又掉进功利的陷阱呢？即便有现实的压力，但办学、教育者应坚持开放、自由、多元、尊重学生的价值和理念，并以这一理念去影响、去改变家长和功利的现实社会。



“油水”

“柴油中水分超标40倍，这样的油你敢加吗？”近日，黑龙江省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绪坤在微信上举报哈尔滨市尚志市苇河镇中石油加油站，称其油质严重不合格。中石油东北销售分公司一位领导曾向记者表示：“此事对公司影响不好，希望你们不要报道。”(《新京报》1月27日)

漫画：徐简

中国“光棍”的迷雾与真相

邓希泉

1月23日,《参考消息》发表了《外媒:中国“光棍”人数可抵加拿大人口》的一则新闻,综合了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和俄罗斯《新消息报》的相关报道,该文称,2013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近3400万人。近年来,关于剩男剩女或性别比问题的新闻,总是能够强烈地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些貌似充满社会舆论意识的新闻报道,除了引起部分公众无谓的婚姻恐慌和心理恐慌的社会情绪之外,似乎并没有对此问题的解决产生多大裨益。相反,这些缺乏科学分析的结论,往往造成了社会和公众对性别比问题的一些误解。

所谓光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没有妻子的成年人。在人口学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光棍数量统计,就是对那些已经进入法定结婚年龄且目前未婚的男性数量的统计;从广义上所指的“光棍”数量,就是对进入法定结婚年龄后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数量差额。我国婚姻法规定男性法定结婚年龄是22岁。那么,广义上的中国“光棍”,应该是指22岁及以上中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数量差额,而不是中国总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数量差额。两种统计口径的结果差异非常明显。

为了更精确起见,本文采用历年全

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作说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395万人,其中,0-21岁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2343万,22岁及以上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1053万。也就是说,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光棍数量应是1000余万,而不是3000多万。从历史对比来看,近10年来,广义上的中国“光棍”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或许有人会说,近1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从21岁及以下男性人口数量与女性人口数量的巨大差距,就可窥一斑。对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事实,从来没有人否认,国家也必须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偏。但同时更应看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瞒报和漏报,尤其是女性青少年人口的瞒报漏报,对性别比失衡起到了遮蔽作用。因而,有必要对男女的性别比作出更科学的判断,以还原实际情况。比如,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数,男婴比女婴多出119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该年龄段人口为20岁人群,但是,男性人口只比女性人口多出62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人口达到法定结婚年龄,需要进行人口申报和获得户籍才能领取结婚证,所以原来一直处于瞒报和漏报状态的女性人口,在全国人口普查时进行了集中补报。

正因为我国人口实际状况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年的数据,就对性别比问题进行简单的推论,遑论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引申和分析?

从人类社会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在一个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国家中,男性青壮年人口数量一般高于女性青壮年人口数量,即青壮年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均高于100,尤其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均是如此。比如,英、法、美、俄、德、日、韩等国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从而导致我国广义上的“光棍”数量较大。但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光棍”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

同时,由于传统文化中对性别偏好、对婚姻问题的社会归因不一样,导致不同社会对性别比失衡的容忍度,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耐受力也并不一样。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比如,中国、韩国和日本均具有男女性别偏好的文化传统,出生性别比和总体性别比均偏高。社会对所谓“光棍”现象,一般归结为男性个人能力或家庭财产欠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性别比问题经历了从个人问题到社会问题的过程,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逐渐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项依据。因此,我们在关注社会潜意识对性别比失衡的容忍和个人归因文化之外,更需要从社会结构层面着手,解决性别比失衡问题。

一些执法部门为何腰杆不硬

申国华

1月2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三亚五星级酒店娱乐吧变身赌场,引起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当晚,当地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三亚市长王勇表示,对于像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这种屡次违规违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不管多牛,坚决查处到底。(人民网1月26日)

一些企业屡次出现违规违法行为,甚至顶风违纪违法,一般而言,不是企业领导不谨慎,而是明知故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少数企业对于相关部门的处理置若罔闻,一些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你今天查他明天开”,与执法部门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尤其是像三亚“酒店变赌场”这场“游戏”,为什么生命力如此顽强,能够持续一年之久?这是更值得深

的问题。

自然界中,猫玩“捉老鼠”的游戏,不是猫捉不住老鼠,而是它以此锻炼自己的捕猎技能。但社会生活中,一些人擅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虽有其手段隐蔽,技艺超群而未被发现的可能,但也不排除相关部门执法不力的因素。

面对一些违纪违法现象,少数执法部门执法不力的原因概括有三:

一是不能。一些企业财大气粗,被地方政府供奉为“财神爷”,上缴利税成了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下,少数执法部门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违纪违法行视而不见。地方政府的宽容和保护会纵容一些企业的非法行为。

二是不想。“违纪-罚款-违纪”,如此循环往复,一些执法部门不是不懂得严格执法,也不是不会,而是不想。如果严

格执法,等同于断了自己的“财路”,一分钱捞不到,搞不好还得罪许多人,与其“鸡飞蛋打”不如“一箭双雕”,“罚款-违纪-罚款”,名利双收。

三是不敢。一些单位和个人之所以敢公然违纪违法,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为其撑腰,“他这边刚感冒那边就有人打喷嚏”。面对此情此景,少数执法部门不敢较真碰硬,总是“绕着走”,而不敢“迎着上”,他们害怕被人“穿小鞋”、“戴高帽”、“摘乌纱”,执法行为常常只能偃旗息鼓。

违纪违法现象几乎都与利益有关。严格执法,不管多牛,一查到底,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斩断其中的利益链。如果不敢较真碰硬,“筐里的柿子——谁捡软的捏”,经常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这样的执法危害不言而喻。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自己本身“缺钙”,腰杆不硬,底气不足,其身不正焉能正人?

创业岂能没有后顾之忧

宋鹏飞

今年起,如果江西省的国企员工想要创业,一份停职留岗的“三年之约”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经过单位批准后,职工可停职创办原单位就业或停职继续创业。(《中国青年报》1月27日)

国企之好,好在待遇,更好在稳定,甚至稳定到以政策创新的手段为员工保驾护航。既想创业发大财,又怕失败后丢掉体制内的铁饭碗,这原本“幸福的烦恼”如今也不存在了,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有关部门这般煞费苦心的动机,据说是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那他们就不怕人才流失导致公有制经济发展受限吗?假如“幸福”的烦恼”如今也不存在了,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关部门这般煞费苦心的动机,据说是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那他们就不怕人才流失导致公有制经济发展受限吗?假如“幸福”的烦恼”如今也不存在了,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有关部门这般煞费苦心的动机,据说是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那他们就不怕人才流失导致公有制经济发展受限吗?假如“幸福”的烦恼”如今也不存在了,谁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何苦硬逼李娜上春晚

辛 杰

2011年李娜首次打入澳网决赛后,让她上春晚就成了网友热腾腾的愿望,当时,李娜就曾委婉拒绝。三年后,李娜终于在墨尔本圆梦,网友们又喊起了上春晚。夺冠后,粉丝们疯狂地在微博上“圈”春晚导演冯小刚,并留言道:“冯导,李娜大热,不上春晚说不过去啊!”有记者问李娜:“如果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打电话邀请你上春晚会如何呢?”李娜表示:“我会把手机关机。我不会上春晚,难得有时间陪家人,我会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请。”(《华西都市报》1月27日)

央视春晚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让一些有突出贡献的名人上春晚露个脸,在文艺方面有些才华的,则让其表演个节目。从神舟五号到神舟九号,历届航天员都登上春晚舞台向全国人民拜过年。至于那些体育明星,则更是春晚的常客,毕竟“文体不分家”嘛。正是基于这种“春晚惯例”,网友们才纷纷觉得,李娜如果

“不上春晚说不过去”,至于究竟是哪里“说不过去”,好像谁也说不出。

让某些名人在万众瞩目的春晚露个脸,无非是一种褒扬和嘉奖。对有些人来说,上春晚当然是梦寐以求的良机,但对李娜而言却恰恰相反。她和其他体育明星不同的是,不太喜欢接受采访,媒体不时曝出李娜“吃记者”的新闻。对于上春晚,她更是极力排斥:难得有时间陪家人,我会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请。

这对于那些满心热望李娜上春晚的人来说,李娜这般的表态无疑泼了他们一头冷水。其实,细想之后也该释然,人们这种热望本来就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李娜本来就不在意“春晚惯例”所附加的荣耀,网友们何必巴巴地希望按照“春晚惯例”强行邀请人家来?

不要硬逼李娜上春晚。对于李娜的斐然成绩,人们可以祝贺,可以狂欢,但不要自作聪明地拿“春晚惯例”来“绑架”李娜、“绑架”春晚导演。

百姓说话

记者究竟在跟谁“捣乱”

杨 涛

7年前,家住泰州泰兴市黄桥镇韩庄村的村民何新攻夫妇超生一名男婴,后被村干部焦某抱走送人。今年1月3日和8日,媒体相继报道了此事。最近,何新攻夫妇花15万元“赎”回了这个孩子,但是疑团仍未揭开。泰兴市委宣传常务副部长张余华称,记者紧盯这个事情不放,思想有问题,“是在捣乱,甚至告状”。(《现代快报》1月27日)

超生男婴被村干部擅自抱走送人,当事人历经7年讨要说法,才花15万元“赎”回孩子,这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事件,不待记者调查,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就应当及时查处。没想到,当地不但不作为,还批评记者“是在捣乱,甚至告状”。

如果说,记者去泰兴市是报道虚假新闻,是挑拨是非,是诽谤中伤他人,是搞有偿新闻甚至敲诈勒索,那当然是“捣乱”,甚至涉嫌违法。但这些问题目前都没发生,记者只是去了解事实,并且要求有关部门查清真相,处理有关责任人,确保这种违法

犯罪的事情不再发生,这又算哪门子的“捣乱”呢?如果记者不进行监督报道,这件已经拖了7年的事情,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对于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而言,他们天生就有一种惰性,如果没有外部的监督与压力,他们不太可能主动去查明真相、纠正错误和处理责任人。记者像牛虻一样,只有不断地盯着官员,他们才不至于在履行公共职责的过程中打瞌睡。

如果记者真不“捣乱”了,只知道歌功颂德,只知道报道歌舞升平,那是失职。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发出警告。”记者必须为社会的危险和不安发出警告之声,如果他们迎合某些官员,放弃自身的职责,以“不捣乱”自鸣得意,那不仅是记者本身的堕落,更是社会的悲哀。